

2007.22

L32d

● 李剑锋 著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李剑锋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9

ISBN 7-5333-1082-9

I. 元... II. 李... III. 陶渊明(365~427)—作品—接受美学—文学批评史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214 号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李剑锋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323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082-9
I·267 定价: 29.00 元

序

1994年上半年,我给硕士研究生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专题,当时听讲的除了跟我学习的研究生外,还有马瑞芳教授指导的李剑锋君。这是我同剑锋的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穿着朴素、言语不多,带有一种农民子弟所特有的憨厚。后来在交谈中,知道他是来自沂蒙山区的一位农民子弟。也许是因为我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刨地、锄草、拉犁、推车、担肥,样样都干过,对农村和农民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所以同剑锋接触感到十分亲切。1995年剑锋硕士研究生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博士,与我一起学习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同他交往多了,对他的了解也加深了。他重立身,诚信不欺。在治学上,他心无旁骛,好学能思。1998年5月,剑锋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不久又确定留校任教,我和他在同一教研室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多年以来,我同剑锋相处,切磋学术,相互帮助,师生之情又加友谊之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几经修改,最近要付梓,我非常欣慰。前几天剑锋嘱我作序,我尽管作不好,但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

这篇论文题目是剑锋自己提出来的。他提出之后,我表示赞同。自我带研究生以来,在论文的选题上,我尽量尊重研究生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思考。我同意剑锋的选题,也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此外,从陶渊明研究的情

况来看,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一位大诗人。至晚从唐代开始直到今天,对陶渊明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相继刊出的论著极其繁富,其中也有一些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陶渊明的。但缺少遵循历史的顺序、系统地探讨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其原因的论著。剑锋的选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陶渊明的研究有所拓展、有所补充。这也是我赞同他选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剑锋的研究成果,已详书中,无须序之赘言,以免蛇足。这里仅就他的论文写作过程,略述一二,以稔读者。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对这一点,剑锋自始至终十分自觉。有关历代陶渊明的研究资料,在剑锋写作时,已经出版的比较全面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教师、56级四班同学编的《陶渊明诗文汇评》。有不少研究者研究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大多依据上面提到的两种资料。剑锋看重这两种资料,但他并不满足。为了对历代陶渊明的接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把复杂性和细微的差别揭示出来,避免笼统粗糙的概括,剑锋决心涸泽而渔,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当时在古籍整理方面,还没有现在的电子文献和检索系统。要想收集元前文献中有关陶渊明的资料,只能一本一本地阅读。有两年多的时间,剑锋以沉稳的心态,几乎天天在图书馆里阅读、摘录。“天道酬勤”,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剑锋全面地掌握、摘录了65万字的资料,其中有许多资料是新发现的。他所掌握的资料,不仅使他的论文言之有据,拓展了视野,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同时在资料建设方面也是大有裨益的。我和他非常珍惜这些资料,也曾联系出版社,争取出版,但因出版社考虑“经济效益”,不予接受,致使这些资料至今未能面世。每当念及此事,心

中顿生遗憾之情。

从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经常面临着如何看待包括西方在内的不同的理念和方法问题。对待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浅见,关键不是要还是不要的问题,而是应当在采摘适当、努力消化上下功夫。在这方面剑锋是相当自觉的。为了撰写这篇论文,他在努力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多方面地学习理论,特别是对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有更多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这篇论文题目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论文当中。他在运用西方理论上力戒生搬硬套,注重融化,大体上能做到盐水相溶。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

作为一个读书人,在治学方面要永不知足。不知足,才能不断向前走。剑锋是一直沿着不知足这条路向前走的。他对陶渊明这棵常青树,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思。他在结束这篇论文写作之后,在尽心尽力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又开始了对元代以后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剑锋有相当坚实的学术基础,加上他诚朴勤奋的学风和富于春秋,他的探讨之功是可望的。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张可礼

2002年4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编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陶渊明接受史的奠基期(东晋南北朝) (19)

第一章 隐名日显 知音其稀	(19)
---------------------	------

第一节 声名悬殊的隐士与诗人 (19)

第二节 在审美时尚中独辟蹊径 (33)

第二章 宋齐时期的陶渊明	(40)
--------------------	------

第一节 颜延之与靖节征士 (40)

第二节 江淹与以假乱真的拟陶诗 (59)

第三章 陶诗在梁代的初显	(71)
--------------------	------

第一节 钟嵘论“隐逸诗人之宗” (71)

第二节 萧统论文如其人的“大贤” (84)

第二编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期(隋唐五代) (99)

第一章 文名渐高 精神广润	(99)
---------------------	------

第一节 流光溢彩的上弦月 (99)

第二节 独具魅力的魏晋风度 (103)

第二章 初盛唐精神的一道风景线	(115)
-----------------------	-------

第一节	王绩酒德文心效渊明	(115)
第二节	走出田园的陶彭泽	(126)
第三节	避俗高士与个性诗人	(136)
第四节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鼻祖	(151)
第三章	陶诗精神在中晚唐的凝定与发展	(168)
第一节	大历诗人与陶诗精神的泛化	(168)
第二节	白居易对闲适情趣的强化	(184)
第三节	晚唐五代诗人与陶渊明	(202)
第三编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陶渊明接受史的高潮期(两宋上)		(219)
第一章	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	(219)
第一节	“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219)
第二节	闻道见性 得韵之极	(229)
第二章	陶诗美学价值在北宋的初步确立	(243)
第一节	宋初六十年的陶渊明	(243)
第二节	开创新局面的梅尧臣	(247)
第三节	别有神会数安石	(259)
第三章	苏轼与陶渊明接受史高潮的到来	(272)
第一节	“地偏心远似陶潜”	(272)
第二节	“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281)
第三节	着意学陶 贵在本色	(294)
第四节	对陶诗的理性阐释	(302)
第五节	个性就是命运	(314)
第四编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陶渊明接受史的高潮期(两宋下)		(323)
第一章	陶渊明历史地位的深化	(323)
第一节	江西诗派与无法可循的渊明风流	(323)

第二节	诗话论陶渊明	(337)
第三节	理学家与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确立	(347)
第四节	辛弃疾爱陶的心路历程	(362)
第五节	在生活激发下解读陶渊明的陆游	(374)
第二章	宋末士人与陶渊明	(389)
第一节	江湖诗人与陶渊明	(389)
第二节	爱国、遗民士人的深刻共鸣	(398)
第三节	方回与陶杜、陶谢并称	(407)
余论: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的几点启示	(422)
主要参考书目		(438)
后记		(450)

绪 论

从学术角度讲,国内文学研究现状特别是陶渊明研究现状促使我去寻求一条新的研究思路,纯粹的朴学研究或者生吞活剥西人理论皆非所长,思索的结果只好是以西方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主要理论参照,兼用旧的方法搜集梳理资料。在此思路影响之下,本书主要对元代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描述和探因。下面就作者对西人理论的理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中的操作方法、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的概况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解说。

接受美学对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从读者出发进行研究的崭新视角,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的研究领域。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是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特别是现代西方解释学,它赋予人类的理解活动以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历史性,打破了传统解释学一直企图寻求本文客观存在的“原意”的迷信。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任何理解都离不开解释主体,都是本文拥有的过去视界同解释主体拥有的现在视界融合后新产生的现时视界。所谓视界,就是理解所具备的知识、情感、观念、阅历等前提要素的总和,是理解事物的立足点。因此,理解既不是本文“原意”,也不是解释主体的主观臆断,而是两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融合后的新的涵义。因此,理解的历史性、不确定性决定了本文“原意”的虚无。任何理解都不

可能是对原意的复制。这给接受美学的基本论点以直接的启示。首先,接受美学区分了本文和作品这两个概念。本文是作者审美意识借助某种媒介固定下来的符号形式系统和开放式结构,在未经读者阅读以前,它正如未被消费的产品不能称商品一样,不能称为作品。作品是本文符号系统和开放式结构的具体化形态,是经读者阅读后,留存于读者意识中的审美客体。因而,其次,接受美学格外突出了读者的作用和地位,与本文中心论针锋相对,提出了读者中心论。本文的“空白”、“未定性”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成为一种充实和确定,本文也才能成为作品,达到自身价值与意义的实现。再次,既然本文只是一种有待读者阅读的多层面的形式结构,那么经阅读后的本文即作品的涵义便具有不确定性和历史性。因为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相当于解释学中的“视界”),对作品的解释便不同。而读者不论就其生理存在而言,还是精神存在而言,都是历史性的,因此,作品的本质便成为历史中永无完成的读者接受结果的展示。姚斯以此为基点提出了新的文学史理论,认为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是被读者阅读、接受的历史。文学史不应只关注作家、作品,同时应关注读者。具体说,即应研究一部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被阅读、理解、阐释、评价等被接受情况。^①

弱水三千,取饮一瓢足矣。本文无意于评述接受理论,但其最富创造性的两个概念:读者与历史,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接受美学基本的论点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尚未自觉的新的研究视点、思路,开辟了读者研究、历时研究的广阔前景。我们不同意接受美学仅把作品当作一种图式结构,将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历史性推向极端的看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作品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和客观存在的,而是随着作者所在时代及

后代读者的阅读欣赏、阐释评价而逐步被发掘、凸现和确立的。并且,这一过程往往不是直线发展的。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其内涵的某一侧面往往先被忽视或发现,其价值、地位、意义往往有所沉浮。从作为审美客体的作品本身看,作品一旦产生,便与既有作品同处一个参照系统中。随着新作品的不断产生,这一作品参照系统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动和调整。因此,作品的内涵、价值等都将因不断面对与其它作品的对比而不断获得自身的被阐释和评价。从读者来看,由于身份地位、文化修养、美学趣味、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的期待视野不同,决定了读者变化多样的阅读、评价作品的标准和价值取向。即使同一读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随着期待视野的变化,对同一作品的看法也会前后有变。从接受环境来看,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美学等社会因素凝定而成的时代精神、读者心态、审美趣尚等也是代代不同的,即接受美学所说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期待视野。另外,对一部作品理解的深度还有赖于人类意识发展的状况。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某个侧面的涵义的隐显、地位的升降浮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苏轼《答谢民师书》)。我们应该承认,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总有些类似或相同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情感体验,而且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有某些形异神似的精神特质和艺术特质。即对一部文学作品,作者赋予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一个既定的实体存在。它们制约着读者的理解并不仅仅体现为变动性、不确定性,同时也有稳定性、确定性。比如,陶诗的田园题材终究是“田园”而不是“游宴”、“边塞”,这是不同读者的共识,即作品的稳定性因素,也是读者理解的稳定性因素。因此,一部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意义的呈现便是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变动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其中稳定性的接受成果一开始往往表现为一种变

动性,确切地说是一种新变性,它是由一些优秀的读者揭示并由同时代或后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欣赏作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比如,陶渊明田园诗在题材上的开创之功并不是读者一开始就意识到的。鲍照拟陶诗、萧统评陶诗着意在陶诗写酒,钟嵘赞陶“《咏贫》之制”(《诗品序》),江淹拈出“田居”为题拟陶,只是个别现象。隋末唐初的王绩在不自觉中接受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到盛唐,随着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对陶田园诗的创造性接受,田园诗成为诗歌创作中的一大重镇,而读者也普遍认为陶渊明最擅长写作田园诗。从此,这一接受成果便因合乎实际而成为陶渊明接受史中的稳定性因素。质言之,稳定性、确定性往往是接受成果的历史积淀、凝定,它体现了作品的某种本质性特点,而变动性、不确定性则往往是接受成果的新变。它既可能是原来接受成果量变性的补充,也可能是质变性的突破。它是读者在作品激发下对作品做出的创新性理解。比如陶诗平淡深粹的特点,虽一直影响唐人的诗歌创作,但却无人从理性上揭示出来。伴随着平淡诗美的思潮在宋代的展开,梅尧臣、苏轼等人才首先揭示了陶诗的这一艺术特质。这便是对陶渊明接受成果的突破。而苏轼之后,众多读者又从不同的角度论述陶诗的平淡美,使其内涵更丰富地呈露出来。这则是对陶渊明接受史成果的补充。由此形成本文理论依据的最基本观点: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便是一部后代读者对作品及前代读者的接受成果的继承发展史、扬弃创造史,是凝定与新变、积淀与突破辩证结合的历史。考察一部作品的接受史,最应注意描绘的是积淀性成果形成的轨迹和突破性成果产生的历程,以及它们产生、形成的原因。这便同只着眼作者在历史上的声誉、影响,而忽视历史环境和阅读中的变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区别开来。

尽管接受美学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崛起后,“东进西渐”^②,历

时几十年,几乎漫延全球,完成了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但接受美学所提供的基于读者视点的自觉的接受史研究却几乎是一片荒漠,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就笔者的目力所及,目前自觉的接受史研究著作寥若晨星,其中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是较早的一部研究专著^③。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力作问世,虽已有相当的资料积累和某些侧面的探索。资料积累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资料的历代汇编,一种是某一重要作家作品的集说,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游国恩《离骚纂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张树波《国风集说》,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詹锺主编《李白集校注集释》等等。侧面的探索,主要是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史的撰述,如《诗经研究史》、《楚辞研究史》。此外还有单篇的论文考察,如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等。上述资料的积累和侧面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大多不是从读者出发的自觉研究,而且大多关注的是读者对作品的评价阐释,而较少顾及特殊的读者(作家)对作品的创造性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然,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到了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问题,如各种文学史在论述一位重要作家时,往往要点到他对后世的影响,其中当然包括创作上的影响,但往往点到为止。近年来的这种影响研究有所进展,如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便论述到杜诗对江西诗派的创作影响,是相当精到的。在陶渊明研究领域,进行接受史方面的研究也是零星的、罕见的。

随着社会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的运用,随着对陶渊明各个侧面的关注,陶渊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被开掘。但我们同时注意到,以往的陶渊明研究多注重静态的、共时的分析研究。有相当多的论文在论述陶渊明的思想、艺术特点时往往

走不出传统的观点,并无大的拓展。这就使那些对陶渊明作动态的、历时的考察研究显得难能可贵。就笔者视野所及,在现代陶渊明研究史上,萧望卿《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首先粗略地考察了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④。该文认为“从晋到唐,陶渊明在一般人眼里是个高雅旷达的隐逸人物……他底诗他那个时代是不认识的”、“唐朝人实在太不认识渊明了”、“到了宋朝……他底形象渐渐明朗确定”、“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到宋朝已有了个纲领,明清两代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元朝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此时一点也找不着)。”但正如萧望卿所云,这仅是“陶渊明反映在人间形象的轮廓,不过那只是他底影子”,材料及梳理的脉络都是极简略的。其后钱钟书的《谈艺录》,以较为翔实的资料梳理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提出“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的精到论点。20世纪50、60年代能注意到历代对陶的评价、阐释问题的论文,可以1961年中华书局结集的《陶渊明讨论集》中的《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为代表。该文认为“晋末和南朝,陶渊明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陶诗真正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还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对陶渊明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元代研究陶渊明的人很少,到明代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工作,大都是解释前代所提出的问题。到了清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近年来出现了两篇考察陶渊明接受史轮廓的论文,它们是钟涛《从陶诗显晦看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观念之走向》、吴兆路《陶渊明文学地位是如何确立的》^⑤。前者认为南北朝是“陶诗的混沌”期,唐代是“陶诗的渐显”期,宋以后是“陶诗的显明”期。后者以为“作为晋末宋初的诗人陶渊明,似乎到了唐代才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宋人对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的评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胜唐人水平”。这两篇综合考察陶渊明接受史的文章

所用材料和观点基本上承袭了萧、钱二位先生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⑥，其新颖之处在于开始联系时代的审美趣味等期待视野考察陶渊明接受史。此外，钟优民《陶学史话》对历代的陶渊明研究有所概述^⑦。以上对陶渊明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的考察，其开路之功不容置疑，但总的来说显得粗略，资料来源明显不足，陶渊明接受史并未得以较为全面、详尽地展开。此外，还有不少对陶渊明接受史上某些特殊读者作个案考察的研究者。在现当代，闻一多是其开山之祖。他在谈到王绩时提出：“陶渊明死后，他那种诗的风格几乎断绝，到王绩才算有了适当的继承人”，王绩“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的”^⑧。其后如王晋光《陶渊明对王安石的影响》^⑨，韩钟文《朱熹论陶渊明》^⑩，袁行霈《辛词与陶诗》^⑪，道坂、昭广《试论初唐四杰笔下的陶渊明形象》^⑫，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⑬等论文论著在论及陶渊明与初唐四杰、王安石、苏轼、辛弃疾等的关系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提出了许多前所未道的观点。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历史眼光或缺少系统性，有时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有些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读者被忽视，如唐代的皎然，宋代的梅尧臣即是。

真实的历史描述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陶渊明接受史资料的搜集成果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但它仅限于后代的评价阐释资料，而且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全面，还忽略了对后世创作影响方面的资料。所以，近年来的陶渊明接受史研究，在资料的搜集上基本没有大的突破。

鉴于以上的理论基础和陶渊明研究的实际，写一部陶渊明接受史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它可以加深陶渊明研究，把陶渊明研究由共时的、静

态的研究转入历时的、动态的研究,为站在前人理解的制高点上,运用当代意识,吸纳前人高见,对陶渊明做出突破性 or 新变性的阐释提供坚实基础。“接受美学意欲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从而将所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为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选择模式。”^⑭陶渊明意义的各个侧面是在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中逐步展开的,陶渊明研究中的具体疑难问题也是在接受中被提出的。只有在系统整理旧说,排除误解的基础之上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创见。比如对陶诗是否源出应璩,历代有不同意见。袁行霈先生《钟嵘评陶“源于应璩”说辨析》一文,在比勘历代意见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陶诗的渊源^⑮。在陶渊明研究中,如果无视前人的接受成果,执一己之见,那就不可能对陶渊明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有进一步的解决,甚至不可能走出前人虽片面却深刻的观点,盲目地进行重复性论证。

第二,通过陶渊明接受史研究,可以察知时代的文艺风气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轨迹,进而深刻地理解与陶渊明的接受相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特别是其中一些难以界定和把握的批评术语,总结某些诗学规律,为建立有个性的中国诗学理论、接受理论系统作切实的铺路工作。接受研究是走向理论揭示的坚实的桥梁。单纯的理论分析与演绎往往因缺少对读者接受事实的关注而显得空泛、不着边际。在接受研究基础上,梳理对被接受对象的认识历程,加深对被接受对象的认识,从而进一步获得理论上的启示,这是接受史研究应循序渐进的道路。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作家中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们认为,接受史研究应当首先关注这样一些在读者阅读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作家。对陶渊明的接受,往往与一些传统的诗学理论、术语,甚至艺术精神紧密联系。从读者对他的接受情况不但可以窥知读者及其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也可以窥知不同时代读

者的共同审美趣味、艺术精神。传统诗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较为固定的术语的内涵,往往在对陶渊明的评价、阐释中显示出来,也在对陶渊明诗作的创造性接受中显示出来。它们是传统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石。另外,在梳理接受史的同时,发现一些有中国个性的接受规律也应是陶渊明接受研究的目标之一。如果借助陶渊明接受史对这些特点、规律进行合理有效的论证、总结,它们便可成为未来诗学理论体系的砖瓦。

第三,可以推动古典文学领域的接受史研究。不仅是陶渊明,任何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家都应有一部接受史。不仅是作家,任何一篇名作、一个流派都应有它的接受史。而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

第四,扩大搜集、利用文献资料的视野。以往的资料搜集、利用往往注重接受中的分析、阐释、评价言论,而忽视了受原作影响的作品。笔者在从事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时,明确感受到以往资料的缺陷,便从第一手资料做起,对一些重要读者的接受资料在仔细、反复地阅读、品味基础上尽量较为全面地占有,共集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资料六十五万言。

第五,对陶诗的一般读者来说,陶渊明接受史研究可以提高他们的鉴赏力;对作者来说,可以提高他们借鉴他人作品的有效方法。比如,拟陶之作历代不绝,有优有劣。如果把一首诗同其和作、仿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便可以品味出孰优孰劣;再进一步思考优在何处,何以优,劣在何处,何以劣。读者的鉴赏力自然可以提高,作者也会悟到借鉴前人的有效途径。这种提高阅读鉴赏力的方法,古人早有所悟,宋代蔡正孙编写的《诗林广记》即是一例。如该书在陶《饮酒二十首》之五后附有东坡和陶饮酒诗、王安石效陶诗,《桃花源诗》后附有王安石的《桃源行》等等。蔡正孙自序中言,此书本为“以课儿侄”而作。可见古人已经在